

# 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

□林盼 赵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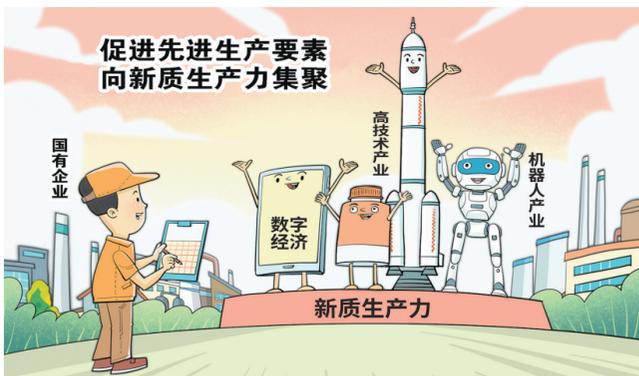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既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坚力量，又是新质生产力发挥作用和实现价值的主要阵地。国有企业应当在宏观层面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中观层面加强总体统筹，增强产业链内部的协同力度；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激发人才创造活力。通过三个层面的共同突破，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

## 宏观层面：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应当破除阻碍国有企业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国有企业联合科研院所、高校等加强产学研用融合，形成具有激励性、系统性的产业技术创新研发环境。

新质生产力要求产学研用高度结合，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对此，有必要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立法保障，强化政策引领作用。一方面，健全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在资金使用、人员流动、设备共享、成果归属、考核奖惩等方面制定具体的法规办法，以规范、约束各方的行为，使合作无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给予产学研协同创新各方在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立项优先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设立专项基金或风险基金，为企业和高校的协同创新牵线搭桥，加强科技中介服务组织的建设。此外，政府还应注重对产学研合作项目的管理评价，深入研究产学研合作项目管理运作的规律和评价指标体系，不断调整合作项目的部署，使产业政策真正“落地”。

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壮大“耐心资本”，可以为投资项目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进而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目前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方式，主要以项目制引领为主，达成共识后开展短期合作，随着项目的结题，合作也随之结束。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研发机构、院士工作站、博士后流动站、科技特派员机构等层次较高的合作方式相对较少。高校的科研人员因为客观条件无法成批、长期驻扎在企业开展科研工作；同时，高校富集的科研平台、仪器设备等创新资源很难为企业所用。产学研协同创新需要构建稳定的合作关系，合作方式在议题设置、资



金投入、利益分配等方面久经磨合才能取得共识，降低沟通成本。当前周期短、规模小、层次低的项目合作，体现出“一锤子买卖”的特征，无法进行长期的、连续性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对此，建议打造“央企/国企+”的创新联合体，吸引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广泛参与，形成突破核心技术的强大体系支撑。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政策，适当调整和改进企业考核与评价机制，打破“一个项目、一笔经费”的初级合作结构，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实现国有企业和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多元协同和深度融合。

## 中观层面：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应当加强总体统筹，增强产业链内部的协同力度，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新质生产力要求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产业链“链长”作用，参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研发和应用。新质生产力以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支撑，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谋划量子力学、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按照增品种、上档次、成产业的工作思路，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编制发布重点产品、重点企业、重点集聚区的目录指南，及时跟踪、掌握国内外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动态，不断完善自身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资本布局，推动技术、管理、金融等资源的有效配置，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的产业集

## 微观层面：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组织架构

应当建立健全符合企业特点的内部组织架构，把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全

群。通过自主创新、带动产业链协同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等方式，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进行产业链整合，通过收购、入股等方式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企业发展，构建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产业门类之间、区域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上下游环节之间高度协同耦合，更好释放产业网络的综合效益。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数字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和市场环境，努力抢占产业体系智能化的战略制高点。有研究认为，当前的产业革命正处于从“信息化”向“数字化”转变的过程中，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通用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将会对传统产业进行根本改造，以此全面系统地改进经济结构质态。相关文献也指出，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驱动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提质增效”，体现在赋能功能、赋能体系和赋能手段三者的有机统一。目前的产业数字化发展存在显著的“孤岛”现象，导致产业链上各个环节无法充分获取到所需数据信息。对此，有必要完善数据数字服务分级分类管理体制，明确数据流动安全评估的具体规则和评估流程，公布评估标准，形成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的“正面清单”，为数据流动提供可信机制和监控能力，形成合规有序、安全可控的数据交易流通机制，探索构建多元汇聚、流通有序的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实现信息共享和价值共创。

## 微观层面：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组织架构

应当建立健全符合企业特点的内部组织架构，把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全

面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有机融合，增强企业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健全更加精准灵活、规范高效的分配激励机制，激发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使科研人员在科技研发及科技成果转化转移转化中获得应有收益，为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提供智力保障。

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高质量党建的引领和支撑。有学者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是新时代党领导下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具体实践，企业党组织发挥着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这也是国有企业所特有的政治优势。要将党建作为企业发展的“压舱石”和“动力源”，积极推动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目前，国有企业已基本实现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有机统一，全面完成“党建入章”，并制定党委（党组）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接下来，企业要进一步

加强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研究、宣传与阐释，通过搭建党建平台和联席会议形式，推动部门党建、企业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通互动，打破常规治理下各司其职、照章办事的组织壁垒，形成“穿透性”的动员合力，引领技术革命性突破。新质生产力要求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需要不断完善科技人才评价和考核机制，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设计更加科学合理的薪酬体系，使人才能够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回报。在评价标准上，应突出业绩，敢于创新，构建以业绩为重点，针对不同岗位、不同年龄段、不同技术职称等，制定分类分层的人才评价序列。创新“揭榜挂帅”等新型科研项目组织管理方式，更大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人才的创新积极性和创造潜能，促进青年人才在科研黄金阶段多出成果。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完善创新培养、使用和吸引人才的机制，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大力培养企业高端技术人才，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

（作者单位：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连云，河北省民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原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5年第4期）

□徐颖 徐鹏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推动志愿服务体系建设”，为新时代志愿服务助力社会治理事业发展锚定战略坐标。当前，志愿服务正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资源整合、社会动员和情感联结，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从“活动型”向“生态型”跃升。新征程，需继续以志愿服务赋能基层社会形成“自治—法治—德治”新动能，激活基层社会“向心力—组织力—多元力”新活力，构建基层社会“参与—协同—共享”新机制，使其真正成为基层善治的“永动机”。

## 以志愿服务赋能“三治融合”

志愿服务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柔性引擎，赋能自治增活力、法治强保障、德治润人心，推动“三治”从机械叠加走向有机融合，实现“法度”与“温度”的动态平衡，最终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

从“被动管理”到“主动参与”激活自治内生动力。志愿服务通过组织创新与技术赋能双轮驱动，重塑基层自治逻辑。一方面，依托“社区能人培育计划”“议事代表”等本土化志愿团队，挖掘居民自治潜力，将矛盾纠纷调解、公共事务协商等职能转化为群众参与的常态化机制。另一方面，借助“党建+志愿”“五社联动”等模式，整合党员、社工、社会组织等资源，引导群众从“旁观者”逐步转变为“自觉参与者”，将零散自治力量整合为高效治理网络。

从“专业缺位”到“精准供给”补强法治服务短板。志愿服务通过专业下沉与场景化普法，破解基层法治资源不足难题。一方面，组建“法律明白人”志愿团队，吸纳律师、退休法官等专业力量，参与村规民约修订、合同合法性审查等事务，提升基层依法决策能力。另一方面，创新普法形式，开展“模拟法庭进社区”“以案释法”等方式解读政策法规，这些实践既弥补了行政力量的覆盖盲区，也通过非诉讼方式降低了基层矛盾化解成本。

从“文化浸润”到“价值共鸣”涵养德治文明土壤。志愿服务以文化浸润与榜样引领为抓手，厚植基层德治根基。一方面，通过“家风课堂”“乡贤理事会”等项目，邀请退休教师、企业家等参与村务监督与文化传承。另一方面，以“最美志愿者”评选、道德模范宣讲等活动树立标杆，发挥“身边人”的示范效应。这种“柔性教化+刚性激励”的结合，使德治从抽象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行动指南。

## 形成“向心力—组织力—多元力”新活力

志愿服务通过向心力凝聚价值共识、组织力整合资源网络、多元力供给精准服务，构建了“价值—资源—行动”三位一体的治理生态。

以志愿文化培育治理共同体意识凝聚向心力。志愿服务通过党建引领与多元协同，将分散的社会善意转化为有序的共治行动。一方面，党员带头组建专业化队伍，联合社工、企业、居民等主体构建“社区合伙人”机制，形成“互助链”式协作网络，破解治理“孤岛效应”。另一方面，推动志愿精神代际传承，用好“时间银行”积分激励、“典型表彰”等文化浸润手段，塑造“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良好生态。

以资源整合构建治理协同网络强化组织力。志愿服务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主体，通过专业化、体系化运作，显著扩充治理资源池。一方面，建立“党建+志愿”联动机制，通过社会工作部整合多部门资源，组建专业服务队，实现“百家部门联动”的规模化效应。另一方面，创新资源调配模式，依托“志愿服务超市”“积分兑换”等平台，动态匹配人力、物力资源，提升服务效率，形成精细化治理单元。这种组织化运作不仅弥补了行政资源不足，更通过跨域协作增强了治理韧性。

以专业服务精准回应治理需求释放多元力。多元志愿者群体凭借差异化技能，成为基层治理的“补位者”与“创新者”。一方面，法律、医疗等专业志愿者针对家庭矛盾、弱势群体帮扶等复杂问题提供精准服务。另一方面，青年志愿者通过“校地共建”模式注入创新活力，联动高校开展科普课堂、网络安全等特色项目，推动治理服务供给侧升级。这种多元主体的精准对接，既优化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也提升了治理响应速度与温度。

##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志愿服务通过创新参与路径、优化协同网络，深化共享内涵，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加速器”，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提供了兼具活力与温度的实践范式。

以志愿服务激活“参与”机制，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响应”向“主动共治”转型。通过培育“社区志愿联合会”“楼栋志愿小组”“暖心驿站”等微组织，以项目化运作引导居民深度参与环境整治、设施维护等公共事务，破解“政府主导、群众旁观”的治理困境，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共治生态。

以志愿服务重构“协同”机制，实现治理主体从“单中心”到“多网络”的跃升。志愿组织发挥枢纽作用，串联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构建“党委领导—志愿统筹—社会补充”的协作网络，开展精准服务，形成优势互补、高效协同的共建体系。

以志愿服务赋能“共享”机制，促进资源从“碎片割裂”到“普惠循环”的升级。通过“支教志愿者+数字教育平台”“共享药箱”“社区文化节”等项目，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实现成果普惠与价值再分配。志愿服务的柔性运作既弥合了资源鸿沟，也重塑了基层信任纽带，为基层共享机制注入人文温度。

【本文系2023年度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资助项目“志愿服务融入雄安新区社会治理的对策研究”（C20231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徐颖，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徐鹏，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投稿邮箱：hbjrbll@163.com

# 以志愿服务「小支点」撬动社会治理「大格局」

# 加快大运河文化带（沧州段）数字化建设

□郭晓月 刘笑言

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20个城市中里程最长的城市，诗经文化、杂技文化、武术文化令人称道，河间西河大鼓、孟村八极拳、青县哈哈腔、河间皮影戏、沧州狮舞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丰富繁荣了当地文化产业。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兴起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了新的机遇。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将大运河文化以更加生动、互动的形式展现给公众，激发年轻一代对非遗文化的兴趣与热情，培养新一代传承者，使古老的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 数字化赋能大运河文化带（沧州段）保护利用的意义

增强沧州大运河文化的保护能力。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为非遗保护提供了具有持久性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通过高清影像录制、音频采集及文字归档等多模态存储手段，可对濒危语言、传统工艺、民间音乐等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细节特征进行系统性保存。3D建模技术能够以高度还原的方式记录非遗手工艺品的结构与细节。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则可通过沉浸式场景构建，对传统仪式及民俗活动进行逼真再现。

促进沧州大运河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数字技术在拓展文化传播维度方面发挥着革新性作用，通过突破时空界限的技术特性，构建起覆盖全球受众的文化触达网络。借助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及在线展览等数字化载体，文化得以转化为更具现代吸引力的传播形态，有效触达年轻群体与海外受众，实现影响力几何级延伸。这种数字化传播范式不仅重构了非遗文化的受众触达机制，更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了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转译与价值再生。

推动沧州大运河文化的创新与产业化。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构成其

可持续传承的核心动能，而数字技术为非遗的跨界融合与产业化实践搭建了全新的生态平台。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非遗文化中视觉纹样、音乐律动感或工艺结构的深度解析，能够为现代设计、时尚创作及影视艺术提供创意源泉。以传统手工剪纸为例，通过数字化设计手段与现代服饰设计的有机融合，能够形成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市场竞争力的创新产品。

## 沧州大运河文化带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机遇与挑战

表层化信息造成深层内涵缺失。数字媒体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多种信息传播渠道，另一方面碎片化、表面化、泛娱乐化的特征也使得其在传统文化的深层认知层面有所缺失。在利用新媒体传播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维护大运河文化的精神实质，而非为了追求视觉冲击效果而丢掉文化的内在精神向度。在对某大运河文化公众号进行考察发现，对于运河文化的介绍仍停留在表层的文字、图片中，这种表层化的传播很难激发受众继续了解运河文化的欲望。

传播路径单一缺乏互动性。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是当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新媒体渠道，通过考察发现，以大运河为主体的账号体量不够丰富。目前只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个官方公众号平台，在微博平台和抖音短视频平台均未发现账号主体，且传播效果欠佳，也从侧面反映出传播内容并没有与受众产生互动，这种单向线性传播模式，降低了传播内容的传播力和互动性，如何丰富新媒体传播路径，拓宽其传播面，推动传者与受者深入的交流互动，是需要我们继续探索的问题。

数字化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在对传统文化内容进行采集输出的过程中，需要在保护文物的基础上，以数据形式进行图像采集、处理、定位、存储、传输、交换和服务，这一流程对工作人员的专

业性要求很高。沧州大运河文化传播在数字化技术运用方面的专业人才还处于短缺状态，大多数是由行政工作人员兼任，如果要利用数字技术将沧州大运河沿岸文化元素呈现出来，专业技术人员的短板还需补足。

## 大运河文化带（沧州段）数字化建设与发展对策

以受众为中心，构建数字化传播矩阵。全民直播时代的到来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种新媒体方式更加的富有人情味，更贴近普通人的视角，从而提升认同度和感知度。如2020年6月13日，在文化和旅游部指导下，抖音推出“非遗市集”直播活动。活动上线第一天视频播放量突破7000万。沧州大运河文化的传承可以借鉴此类成功经验，由各地政府部门牵头与短视频平台达成合作意向，举办“云游非遗”为主题的影像展、直播秀等活动，将大运河文化分解成不同内容的主题进行传播，由浅入深地激发数字媒体平台和文化的双向互动，引发关注和关注。

打造VR技术数字产品。可借助VR技术再现运河风情、打造VR虚拟非遗线上课程和VR虚拟非遗数字展厅。使用数字技术，对运河沿岸的历史建筑、民俗风情、交通工具、传统文化等进行交互展示，突破时空的限制，使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端、电脑端真实感受到大运河的魅力，感知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

构建高校志愿服务体系。依托高校自身在非遗文化教育与学术研究领域的资源优势，开展系列线下公益课程，如“非遗高校行”研学活动、非遗主题游学项目等。通过数字化展示模式突破物理空间的约束，使非遗文化得以跨越地域与时间界限，持续推动沧州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传播创新与价值再生。

创新“文旅+”数字资源服务场景。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要融入当代，其实施主体包括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非遗

传承群体及大众。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流活动，例如在线上设置虚拟旅游景观，在线下开展课程论坛、讲座和比赛等，制造出圈非遗IP产品；以崭新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弘扬非遗中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念和思想情感；创作原生沉浸式数字文化内容，开发数字藏品，制作裸眼3D、虚实结合的多元数字文化产品，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沉浸式内容展示与保护。

以人才引领大运河文化传承建设。大运河文化的传承离不开传承者，数字化建设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专业人才推动。这就需要相关专业人员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互联网技术和精通数字技术，还要通晓大运河文化。如充分利用本地高校资源，通过学校教育灌输大运河文化知识，培养文化传承者。可根据大运河文化特点开设相关专业课程及实践课程，为大运河文化的数字化传承保护利用事业奠定人才基础。

文化出海，构建数字化国际传播矩阵。依托5G、VR/AR及区块链技术，构建沧州大运河文化特色的数字化国际传播矩阵。在技术实施层面，可分三个层级推进。基础层：建立大运河文化遗产数字孪生系统，对连锁谢家坝等水利工程进行三维激光扫描，对武术套路、杂技表演进行动作捕捉，对接国际文化遗产数据共享平台；应用层：开发“数字运河”交互式体验平台，通过VR技术还原漕运码头的商贸场景，设计“武术非遗虚拟学徒”互动程序；传播层：在TikTok等国际平台构建多语种传播矩阵，采用“微叙事”策略——以3分钟短视频拆解吴桥杂技中的“顶碗”技艺，配合英、法、阿拉伯语字幕，结合算法推荐实现精准触达。此外，可引入“反向叙事”策略，邀请国际媒体拍摄“外籍学者解码运河”纪录片，通过海外视角解构文化符号。

【本文系2024年度河北省社会发展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2403162）】  
（作者单位：沧州师范学院）